

美国清史研究的若干观点

张伟应

2019年3月19日

一、作者、作品

- 罗威廉（William T. Rowe）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博士，曾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主任，期刊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帝制中国，原名Ch'ing-shi wen-ti）主编（1992-2007）。
- 主要学术领域是近代东亚社会经济史、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史。
- 个人著作有：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汉口的研究；中国一个县城700年暴力史的专著；研究十八世纪中国精英人士的书籍等。还参与了《剑桥中国史》第九卷“1800年之前的清朝”的撰写，负责（上册）“社会稳定与社会变迁”一章的内容。
- 《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王朝》出版于2009年（英文），是6册哈佛大学“帝国中国史”丛书（卜正民主编）之一。
- 作品的资料来源：英文研究成果，汉语和日语研究成果。引用两者的书目462种、48种。

二、导读、评价

- 清代全史。
- 复合式结构（不单纯以时间为叙事轴，结合事件与内容构建纲目、要领）。全书十章，分为前后两部分：“征服”“治理”“盛清”“社会”“商业”——迅速由乱而治；“危机”“叛乱”“中兴”“帝国主义”“革命”——从危机到终结。主线：清王朝与别的朝代不同（异族统治的少数政府；多元疆域、人口剧增；十九世纪之后的全球竞争挑战）。主题：帝国统治。（关于“帝国”“帝国主义”的概念，见P227。本题标注页码均为台大版中译本，下同）
- 体现西方清史研究的三个重要转向：社会史转向（长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进入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历史变迁的动因）；内亚转向（由满洲的少数族群建立的帝国，这个政体最根本的少数统治特质）；欧亚转向（比较同时期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俄罗斯的罗曼诺夫王朝等“陆权帝国”）。
- 译者李仁渊介绍：将四十多年来英语学界清史研究的发展整合进一套层次分明的架构之中……

三、部分观点

- 1、关于“满”“清”“汉”与“中国”
- 2、盛清
- 3、中西关系
- 4、同治中兴
- 5、危机、革命（清朝终结）

1、关于“满”“清”“汉”与“中国”

- ——在明朝大部分的时间里，“满族人”并不存在。（P16，标注页码者均为引文，下同）正蓝旗官员佟国纲（可算康熙的叔伯辈/舅父，因其辽宁佟家的一位成员是康熙的外祖父），1688年上书康熙帝，要求将他的族籍从“汉军”转为“满洲”。……而其他佟姓族人（在武昌的远亲）则仍保持汉人身分。……族群认同远非由基因所决定，而是模糊且具有弹性、可以经由协商改变的。（P13）无论清朝征服者是种族特征鲜明的边疆民族，或者是被特意建构而成的征服组织，他们的成就实属卓越。（P16）
- ——大清帝国在性质上与之前各代相继的汉人或异族王朝有所不同。作为标准的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形态之多民族普世帝国，其在扩展“中国”的地理范围，将如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斯林与其他非汉民族，整合成一种新形态、超越性的政治体上，取得惊人的成功。渐渐地，中国士人开始接受此重新定义的中国，并认同其为自己的祖国。（P281）

2、盛清

- ——（清治前一百年）中央政府有三次行政上的创新，……1638年建立“理藩院”，即“统治外围省分之部门”，重要功能之一是举行各种繁琐的仪式，用以将内亚诸民族象征性地整合在帝国之内；内务部（入关前即有，1661年正式成立、被制度化），提供皇帝个人服务，并管理皇帝在帝国内的各种私人财务收入；最重要的创新是军机处，开始是非正式的军事咨询机构，康（后期）雍朝渐成宫廷内常任枢密会议组织，提供皇帝（各领域）私人建议。（P39 - 40）
- ——一般而言清代人民总体的租税负担并不会太重。事实上，很有可能被课税过少。特别是在18世纪中叶，清政府趁着盛世之际，以多次特定的改革达到轻徭薄赋。无疑地这是儒家的“仁政”，但也降低清朝在遭遇新威胁或预料外需求时的动员能力。而藉着藏富于民，清政府可说助长了人口成长速率，而这些人口最终却耗尽了国家的力量。（P43）1713年，（晚年）康熙认为未来将永远没必要再提高田赋的基本税率。（P64 - 65）1745年，为庆祝登基十年，乾隆宣布一项大规模的田赋减免，减征了约2800多万两银子。（P67）

2、盛清（续）

- ——“常平仓”制度。不仅要确保各地粮食供应无虞，更要让地方市场的粮价稳定、实惠。……历史学家曾经一度以为，此有大量史料记载的稳定物价机制从一开始不过是一种官僚式的虚构，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机制的确发挥效力，而且事实上在清朝盛世时运作得出奇良好。（P55）另外还以“货币供应管理”为例，称其展现清朝政策中“出色洞察力与行动力”。（P56）1781年的造假丑闻，（P86）（贪腐）是盛世中的“警讯”，还有帮会。
- ——在15世纪与16世纪，欧亚大陆东西两方都开始经历所谓的“现代人口成长”。中国1700年代人口约计1.5亿左右；大略相当于一百年前明朝的人口。1800年时，超过3亿人。而1850年太平天国之乱爆发前夕，人口更可能已经达到4.5亿。（P88）
- ——虽然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总是由农民组成，且西方长时间认为中国是农业社会最名符其实的典型，不过到了清朝中叶，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商业化的国家。（P119）欧洲传教士，对外贸易（朝贡贸易、广州体系）。

3、中西关系

- ——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以倍数成长，从17世纪晚期约每年200磅，到几十年后约40万磅，再到19世纪初期的2800万磅。（P161）被用作娱乐性毒品使用的鸦片在清帝国流行，很类似茶在英国盛行的情形。……经过18世纪晚期及19世纪早期，自广州输入的鸦片数量增加了10倍。英国人知道此贸易并不道德，传教士经常谴责此事……（P162）
- ——鸦片贸易前后，西方著作中对中国描述的变化。（P163）
- ——由于《南京条约》及其后续条约的影响，导致清朝在双手被反绑于背后的情况下，进入了西方扩张及强烈国际竞争的新时代。（P168）
- ——（1895年《马关条约》后）虽有（美国）门户开放照会之声明，清朝领土主权显而易见地是个神话。（P232）（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大清帝国的国家主权就成为几乎没人相信的神话了。（P242）
- ——清末十年在用语上明显的转变，是从“救国”免于瓜分或灭种这样的防御性目标，转向更积极地宣示“主权”，这个崭新、热门的主权概念成为军事民族主义行动的团结号召。（P272）

4、同治中兴

- ——四种观点。费正清等，同治时代是“西方影响中国以及清朝‘现代化’的第一个重要时代”（西化高潮）；芮玛丽，“湘军核心官员的失败（英雄）悲剧”，指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和最重要的曾国藩（汉人爱国之士，他们持新儒家信念）；政治力量地方化，直到20世纪军阀割据达到顶点（李鸿章为例）；地方社会中的精英崛起（地方显贵增强了权力和影响）。

5、危机、革命（清朝终结）

- ——白莲教乱（1796 - 1805）。白莲教本质上是分散的、地方性的，很少有集中的宗教阶层或系统性神学。出自于北方的教派传统……（P179）白莲教乱不仅代表着清朝军力掌控式微的一个转折点，也使得朝廷无力遣兵到东南沿海打击海盗、抵抗英国侵略的日益威胁以及镇压内部的叛乱。……拖垮了中央政府的财力。（P181）
- ——太平天国（1850 - 1864）危机。加上：欧洲列强的第二次入侵。（P186）以及引发的捻乱和回变……。太平天国战争特别血腥残忍，直接造成约3000万人的死亡。经济上同样受到严重破坏。（P193）

5、危机、革命（清朝终结）续 1

- ——20世纪初中国史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试图从清帝国的遗迹中形成“民族国家”。（P250）……（但）这些年的民族主义并非明确无疑地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到了1870年代……民族主义已被利用来为极为狭隘的中央集权服务。……当民族主义者的呼吁真正在世纪之交前后扎根于清帝国时，某些例子听起来非常民主化，但他们已在其中保留了反自由主义的种子，1911年后这将显示在优生学式的“种族净化”以及领袖们接连的独裁野心中，包括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全都是优良的“民族主义者”。（P251）
- ——（朝廷为中心的改革）1900年的清朝……展现出新的爆发力，恢复相对强而有力的中央领导和有能力的行政部门。朝廷称之为“新政”。……1901年初，西安“罪己诏”发布。“言路”开放至前所未有的程度，邀请所有的清朝人民提出对改革的意见。之后，直到1908年慈禧去世之前，有一系列的诏令要求政府和社会各个层面进行改变。（P251 - 252）……新政最终并未让中国统治世界，也未解决其多重的问题。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反而加剧了社会紧张和政治上的不满。但改革的意图无疑是真实的，其影响很确实，其长期意义相当大。……逐渐建立一个更具侵入性、更有力的现代国家，这个过程将持续发展，至少到20世纪后半的毛泽东时代。（P253 - 254）“两次狂热的改革浪潮（1895年、1905年）”，“为了直接回应日本在中国境内的胜利”。“日本是中国最具威胁性的外敌，但也是其最重要的模范。”（P260）使之（省咨议局）诞生的1909年选举是中国帝制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P275）。

5、危机、革命（清朝终结）续 2

- （回应“孙逸仙中心”的两种观点）西方尤其是美国历史学家对1911年共和革命的观点，……“在革命过程中众多运作的复杂力量，若未比孙逸仙的个人贡献更大，至少也同等重要”。（P258-259）如“他的亲近伙伴黄兴和宋教仁的贡献”，“与孙逸仙本身明显较无连结的群体，例如学生和知识分子”。“那些并非公开革命派，甚至反对革命的个人和力量对于革命的贡献也被认可了”。（P260）学生（留学生），从1890年代晚期的十几人，到20世纪初期的数百人，1905年超过8000人。构成了“世界史上最大的海外留学生运动，也产生大部分中华民国时期第一代领导人才。”（P261）“一整代人的激进化，可看作是新政改革未能预料到的后果（惟此结果也进一步证明这些改革的真实性）。”（P262）职业革命家（孙逸仙）。“（职业）革命家的重要性，比在旧诠释中小了很多。这是一场比其所有领导者还要巨大的革命。”（P267注35）“事后来看，他似乎是偶像般的革命领袖。”（P270）改革精英派，“他们从未公开为革命家，但实际上可能是所有人中最具革命性的。”这些人中有“大型商人”，有“混种的绅商”，（P270）和“士人阶级”（古籍经典教育；新式士绅如教师、银行家、工矿运输业投资者、法律医学新闻专业人士和新知识分子）。（P271）……革命主力全是新政改革所创的机构：新军、商会、咨议局。（P278）
- 1911年的中国……实然、普遍而焦虑地认知到大清王朝天命已尽。（P277）